

# 浙江古代海洋

## 文明史

明代卷

贾庆军 钱彦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浙江古代海洋 文明史

明代卷

贾庆军 钱彦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古代海洋文明史. 明代卷 / 贾庆军, 钱彦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161-8567-4

I. ①浙… II. ①贾…②钱… III. ①海洋-文化史-浙江省-明代 IV. ①P7-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7972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秦 婵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84 千字  
定 价 82.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关于浙江古代文明史，已经有多部著述问世了。但关于浙江古代海洋文明史的著述还未曾见。当今之时，面向海洋的发展日益成为文明的标志和方向。而当我们迈步向前时，有必要对古代海洋文明的发展有所了解。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让我们前进的步伐更顺畅。

笔者不揣冒昧，对浙江明代海洋文明进行了一番浏览，大致内容如下：

一、在海洋政策方面，明政府采取了海禁的政策。在明代，整个浙江的海面在政治上是受管制的。而明代的海禁政策有其文化和政治上的深层原因。明代外交以天道思想作为其外交的指导思想。天道外交的主要思想是夷夏秩序观念、战和观念和义利观念。所谓夷夏秩序，就是在对天道践行程度不同基础上，形成核心国和附属朝奉国之间的单线辐射型关系。在这一秩序中，各国都要做到内安其民，外安其分。同时附属国要履行一种象征性的朝见贡奉礼节，其中也包括朝贡贸易；在天道外交中，战和关系一直存在，明统治者出兵的原因可归为两类：一是在礼数上的冒犯；一是对边境的武装侵犯。不到万不得已，明统治者不会动用武力来对付外夷。而战争也不是肆意杀戮，通过战争使夷人领会天帝仁德之大道，才是明作战的真正目的；在天道外交中，对商贸是不重视的，天道思想追求的是中庸与整体和谐，仁德秩序和礼乐之风是其核心内容，经济并不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为人们所诉求。过度的商贸行为是与天道背道而驰的，因此要严加限制。最后，与近现代人道外交相比，天道外交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其优越性在于：尊天道及由其形成的自然等级秩序，有利于保持世界之整体性与和谐性；其推崇中庸和节制，有利于防止恶性竞争和私欲泛滥。其局限性在于其难操作性和不稳定性，以及无法应对极端的挑战。近现代人道外交要成为一种更完善、更成熟的外交模式，须对天道外交进行更完整、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浙江无疑成了明天道外交实验的一个典型场所。在与日本的交往中，尤

其体现出天道外交之特点。尤其是在其缺陷性上体现得较为明显：首先是其不稳定性。天道外交需要统治阶层的智慧和德行来支撑。在洪武到永乐年间，政治清明，统治稳定，中日关系也较为稳定。而到了嘉靖、万历年间，皇帝怠政、挥霍无度，吏治腐败、军队腐朽、社会动荡，因而导致内忧外患。而内治不举，必然招致“四夷交侵”。出现倭寇现象在所难免。猖獗于浙江沿海的倭患和统治者的才能与德性是有着重大关联的。其次，天道外交无法应对极端挑战之局限性。由于天道秩序寻求一种整体性与和谐性，它不允许发展极端的東西，包括商业和贸易等。它对自然的态度就是整体模仿和利用，就不会将其拆开来当作对手来细致研究和解剖。在传统天道外交来看，整个宇宙应该是和谐的，只是人的妄为才导致了秩序的紊乱，人们要做的就是对付那些人欲过剩的国家或民族，而且在传统社会里，欲望的表达也是有界限的。如此，天道模式下各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就停留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无休止地去征服和占有。而这就使其无法应付极端的挑战。尤其是对财产等物欲无限渴求的国家的挑战。近代西方人且不说，就是在传统社会里，也有不安分的国家，如日本等。其对财富和疆土的贪欲令明朝异常头疼。不过，由于日本人仍在传统文化框架内，其武力并没有超出人身之界限，明朝还可以应付。

而近代西方人对生命和财产的追求使其发展出令人震撼的科学技术。其征服的欲望超出了有形的限制，向宇宙无限延伸。依赖先进技术，西方将其势力扩张到全球。虽然人的过度欲望是该受批判的，科技也是其对自然片面理解的产物，但不可否认，欲望是人之自然属性的一部分，科学认知也是对万物的一种认知和理解，这两者部分符合了天道之真理，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和效果。而且西方现代人道思想及外交已经渗透到全球了。人道的这种极端的发展就令传统天道无法应付。如前所述，虽然明代统治者也考虑战争与和平、武力和文化的辩证关系，但其对威胁的考虑仍局限于天道自然之水平上，没有预料到一种极端的武力发展，即大大超出人之自然力的机械武器的出现。

所以，浙江沿海的清静必然是暂时的，闭关锁国无法应对极端商业社会的武力入侵，随着西方商业的发展和武器的升级，用枪炮冲击中国海关大门是迟早之事。从长远看来，走向海洋，走向世界是不可避免的。

二、在海洋经济方面。虽明政府较长时间推行“海禁政策”，但对于日趋繁盛的浙江地区海洋贸易潮流却无法遏制，更有甚者政策越严厉执行，而私人贸易就越繁盛，使得有明一代整个浙江沿海对外贸易呈现两极分化态

势，一方面是官方贡使贸易时涨时落，一方面是私人走私贸易持续高涨。这是明代海洋经济的鲜明特点。

这种海洋经济及海外贸易形式和当时浙江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其农业生产具有了商品化倾向。其次是明代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海洋经济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具体表现是：（一）商贸意识的日趋增强与海洋的进一步开发。（二）私人贸易的越发活跃与商帮的出现。（三）海洋资源的开发与海洋贸易的继续发展。（四）“倭患”对浙江海洋经济的影响巨大。其规律是：倭患严重时，中日正当贸易受到极大威胁，海上私人贸易呈勃兴的态势；倭患被平定，海上环境趋于平静时，中日正当贸易呈现上升态势，但同时一些私人海上的活动也并未消退，海洋贸易呈稳定增长的状态。

三、在海防建设和海上军事外交方面。在海防建设上，明代军事设置采用卫所制，而浙江卫所是明政府军事设置的重点。后来发生了海贼倭乱之后，为了剿贼抗倭需要，浙江卫所数量不变，而千户所则有所增加，增加至31所。为了应付倭寇，明政府加大了战船的制造，浙江成了明政府战船制造的主要基地之一，浙船成为明三大海船之一。

正是由于出现了海贼倭乱，在浙江海面就发生了长时期的剿贼抗倭斗争。发生在浙江的战役不胜枚举，较为著名的有双屿港之战、普陀山之战、石塘湾之战、曹娥江之战、桐乡之围、慈溪之战、梁庄战役、舟山战役、剿灭王直、台州大捷等。

虽然抗倭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明朝军事和政治上的弱点：在军事上，明代军事将领很少懂得谋略。这使得明朝将领在军事上的胜利难以长久维持。另外，将领的腐败导致军力削弱。最后，军事将领之间互不信任，拉帮结派，互相拆台，给脆弱的军队又雪上加霜。而军事上的脆弱归根结底乃明朝政治所导致。

在政治上，家天下式的管理使各种弊端积重难返。家天下式的管理方式必然会滋生腐败，最终是统治动荡、内外交攻，不堪一击。可以说倭乱就是统治失衡的结果。统治者不能明察沿海居民所求，强制推行海禁，而不是利导之，最终致使谋利之徒公然犯禁。而与倭寇作战过程中更显示了朝廷之昏庸，上面赏罚不明、任人不智，下面则欺瞒矫饰，导致军队战斗力每况愈下。剿贼抗倭功臣朱纨、胡宗宪没有死在贼寇之手，却死在同僚倾轧、皇帝昏庸之手。政治上的昏聩必然致使外交上的混乱和失败。虽然抗倭战争最终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但其军事和政治的脆弱已经显露无遗。当其遇到一个更

强大的对手时，其崩溃之期也就不远了。

四、在海外交流方面。明代浙江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一部分是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在明代，宁波成为浙江对外交流的唯一出口，而交流的主要对象就是日本。日本频繁来中国朝贡，除了其经济政治上的交往，同时也有文化上的交流和互动。日本文人频繁来宁波等地与浙江文人进行交往，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通过这种交往，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如下特点：（一）入贡时间虽然间隔较长，但交往仍很密切。（二）日本文人爱慕中华文化之心流露无疑。明代传统文化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完善。这就使日本文人倍加敬羨和爱慕，日本文人的主要载体是日本僧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也主要是靠这一群体。（三）明士人对日本文人评价很高，皆因其学习和使用中国文化方面达到很高程度。

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科技文化的交流；一部分是宗教信仰文化的交流。在科技文化方面，与西方交流较多的是天文历法知识，其次还有数学和地理知识。在这些交往中展示了明人对西方科技的基本态度：既承认西学之精准，同时又强调中学之源流。仍有一种优越之心态在里面。其将西学这种精准看成好奇、喜新、竞胜之习性的结果，本身就有着一种轻视。

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方面，体现了传统儒学与天主信仰的冲突和交流。对天主教的主流态度很明显，就是怀疑和拒斥。对于西方人所信仰的天主和耶稣，明廷士大夫皆认为是荒诞不经之物。虽然允许利玛窦等传教，但当其与儒家正统思想发生冲突时，统治者就会考虑禁止并驱逐之。其遭驱逐之普遍原因可归纳如下：（一）天主教传播者妄自称胜，即认为天主教是最高的信仰，贬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二）私自聚众，形成民间势力，威胁社会和朝廷稳定。传统社会是家国体制，稳定和谐是重中之重。任何能够威胁到社会和政权稳定的事情都要禁止。民间的私自集会和信仰活动就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任何活动只有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才能进行。同时，更要杜绝外来力量对本国民众的驾驭和渗透。

综合这两者，我们可以说，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在威胁到中国正统和国家权威的时候，就很可能被禁止。然而，统治者对西方传教士还是有好感的，尤其是利玛窦等走合儒路线的传教士。他们不仅谨慎对待儒家思想，还在现代科技上帮助了明廷，如日食的测定和历法的制定等。这就使明统治者在禁止其传教方面并不走极端，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传教活动不触

动上述两个底线，传教士的活动还是可以开展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浙江的传教士活动，其活动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产生了一批儒士基督徒，如李之藻、杨廷筠、朱宗元等。他们试图融合儒家思想和天主信仰，但其融合成功与否，令人怀疑。其思想一般由合儒、补儒、超儒三部分组成，然而在其对儒家学说的附会和比较中，多出于误解，这就致使调和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天主信仰始终没有融入明朝主流思想中。

五、在海洋观念和意识方面。通过对明代海洋文学作品和海神信仰的考察，我们可以一窥明代浙江人的海洋观念和意识。明代浙江人的海洋意识基本上是传统的。海边居民对大海有一定的依赖，并希望形成一种和睦的关系。随着对海洋的逐渐熟悉，他们和海洋结成了亲如一家的关系。但这并不是全部，技术的局限和大海的不稳定也给他们带来了困苦和烦恼。他们在感恩大海的同时也恐惧和埋怨它。除了这两种矛盾的心情，还有对海洋的敬畏和信仰，这就是海神崇拜，而对海洋的征服意识似乎并没有占主导地位。而对于社会上层人士甚至统治者来说，对海洋的观念还有所不同，具体表现如下：（一）在政治和疆域上来说，陆地是传统统治者所管辖之区域，也是其权力的边界。大海则是陆地的尽头，它更多被看作疆域的边界和抵御外敌的屏障。（二）大海及海上渔民生活并不是人们谋生的首要选择。在传统社会中，农业是最根本的谋生手段，这也是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中最为理想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反映。（三）海边生活投射在人的精神层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四）虽然海洋在传统社会难以被权力笼罩，但海洋的状态和国家安定仍有一定的关联。海洋的安定与否影响着陆地的安定。若海不平静，就会影响到在陆地上生存的人和物，使人们没有安全感。所以，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虽不会统治大海，但最低限度上要保证大海的安宁，包括不受外来威胁的侵扰。这种感觉会催生古人独有的天下观或国际秩序观。其进一步延伸就是夷夏国际秩序之设想。尽管陆地是权力的界限，但若海外不安定，一国也难安定。因此一国的安定就有赖于整个天下或宇宙的安定。但这种夷夏国际秩序和现代霸权不同，它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

六、在海洋灾害防护方面。明代浙江雨、雪、水灾甚是频繁。对于民心，明统治者是最在意的，因此，在救灾问题上他们是非常积极和重视的。在救灾措施上有以下几种，即赈灾、修河渠和海塘。明代君臣对赈灾策略和措施有详细的研究和讨论，其赈灾行为也是在具体的策略和措施指导下进行的。

通过对明代浙江赈灾的大致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明代赈灾之基本特征：



其一，有系统的理论。皇帝及其大臣都以传统天道思想为其理论基础，论证了赈灾的必要性。其二，有具体的赈灾策略和措施。可以看到，明代君臣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赈灾策略和措施，从政府到民间、从朝廷到地方，各个层面所应担负的职责和注意事项都有所考虑。其三，有成熟的经验和较为周到的准备。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明政府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赈灾经验。在赈灾的储备和应对过程中，明政府的安排还算有条不紊。其四，灾害过多，考验太大。尽管明政府有积极的态度和周密的措施，但其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过于频繁，最终导致其国库空虚，疲于奔命。这也影响了其赈灾的效果，而民间义军的兴起也与此有关。再加上外来入侵，军饷加派，内外交攻，终致明政权摇摇欲坠。

明代在浙江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河渠、海堤的修建，从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特点：首先，除了地方官员要尽职尽责外，平民百姓也可以直接向朝廷提议进行河渠和海堤建设。明朝历代皇帝很重视民间的声音，这也反映了天道生民之法则。其次，海洋灾害频繁，河渠海堤不断被冲毁和重建，这也加大了民众的负担，影响了明朝的国力。

综观明代浙江海洋文明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浙江的海洋文明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其海洋政策、海洋经济、海外战争、海外交往、海洋文化等各方面皆表现出了传统的特色。在没有遇到西方大规模入侵之前，这种文明还是有周旋余地的。而当进入现代的西方挟着一种极端的力量来叩关时，传统文明就难以抵挡了。因为传统文明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很脆弱且往往又被昏庸的君王和贪婪的大臣所打破，但它一直是传统社会的追求。这种平衡社会很难抵御极端社会的攻击，如极端发展物质力量的现代西方。这促使我们思考，传统社会的整体构想和平衡发展思想是否有它的可取之处？我们目前的极端发展能否再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实现整合和平衡？这恐怕是当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探索。

鉴于笔者学力之不足，所探讨之领域和所归纳之观点仍有待扩展和深入之处，敬请专家不吝赐教。

# 目 录

第一章 明代政权的建立与海洋政策的调整 .....	(1)
第一节 明政权的建立及对浙江控制的强化 .....	(1)
一 明政权的建立与其对外政策构想 .....	(1)
二 明统治者的海洋政策 .....	(55)
第二节 明在浙江统治的确立及其浙江海洋政策的调整和发展 .....	(60)
一 明在浙江统治的确立 .....	(60)
二 明代浙江的海洋政策 .....	(61)
第二章 明代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 .....	(63)
前言 .....	(63)
第一节 明代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原因 .....	(79)
一 自然资源与交通条件对浙江海洋经济的影响 .....	(79)
二 政府政策对浙江海洋经济的影响 .....	(84)
三 中外贡使关系对浙江海洋经济的影响 .....	(110)
四 明代浙江社会状况对海洋经济的影响 .....	(115)
第二节 明代浙江海洋贸易发展概况 .....	(128)
一 浙江商品经济的发展 .....	(129)
二 浙江海洋经济的发展 .....	(159)
第三章 明代浙江海防与对外交流 .....	(171)
第一节 明代在浙江的军事设置和海防建设 .....	(171)
一 明代浙江的卫所设置 .....	(171)
二 明代浙江海防建设 .....	(173)
三 明代浙江的军备情况 .....	(178)
第二节 明代浙江的对外军事活动——剿贼抗倭斗争 .....	(181)
一 双屿港之战 .....	(182)

---

二 十余年抗倭斗争 .....	(183)
<b>第三节 明代浙江对外文化交流</b> .....	(187)
一 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	(188)
二 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	(195)
<b>第四章 明代浙江的海洋观念和海神信仰</b> .....	(261)
一 明代文学作品中的海洋观念和意识 .....	(262)
二 从明代戏曲《齐东绝倒》看浙人之海洋意识 .....	(274)
三 明代舟山地区的观音信仰 .....	(282)
<b>第五章 明代浙江海洋灾害与政府的应对</b> .....	(291)
一 浙江雨、雪、水等灾害 .....	(291)
二 明政府对灾害的应对 .....	(293)
<b>结语 明代浙江海洋文明的基本特征</b> .....	(314)
<b>参考文献</b> .....	(323)
<b>后 记</b> .....	(342)

# 第一章

## 明代政权的建立与海洋政策的调整

明政权在浙江建立开始，就对海洋政策进行了调整。其海洋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严禁。这种严禁部分出于军事安全考虑，部分是传统思想之产物。这种海洋政策的严格执行导致了一种奇怪的贸易形式——朝贡贸易，也招致了嘉靖大倭乱。对这种海洋政策的讨论和思考贯穿了明朝始终，然而最终也没有彻底解决。

### 第一节 明政权的建立及对浙江控制的强化

#### 一 明政权的建立与其对外政策构想

1368年，明政权建立。从政权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就已经思考过了对外关系的问题，并为后世子孙打下了基调。总体看来，明代统治者采取了与宋元不同的海洋政策，而学术界也基本是以海禁来概括明代对外政策特点的。<sup>①</sup>

---

<sup>①</sup> 关于明代海禁政策的研究，硕果累累，简要列举如下：王守稼：《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兼评海禁与弛禁之争》，《史林》1986年第3期；怀效锋：《嘉靖年间的海禁》，《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刘成：《论明代的海禁政策》，《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晁中辰：《论明代的海禁》，《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李映发：《元代海运兴废考略》，《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黄盛璋：《明代后期海禁开放后海外贸易若干问题》，《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朱江：《唐代扬州市舶司的机构及其职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邓端本：《论明代的市舶管理》，《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晁中辰：《论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苏松柏：《论明成祖因循洪武海禁政策》，《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金明：《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陈尚胜：《明代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陈克俭、叶林娜：《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与福建财政经济积贫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 （一）明代海禁政策研究巡览

对于明代海禁政策的研究，较突出的学者有晁中辰、李金明、陈尚胜、万明、庄国土、黄盛璋等。其中晁中辰先生对明海禁政策研究较为系统，其专著《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是近年研究明海禁政策的力作。在书中，晁中辰全面考察了明代海禁政策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同时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在明代以前，要么是官方派船出海，要么是经官方许可后，私人船只出海进行贸易，从未有所谓海禁一说。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海禁，既不许私人船只出海，也不派官方船只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亦不许来华，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甚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这实际上是对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发展的反动。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松弛，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私人海外贸易在暗中渐有发展。正德年间始行抽分制，使明廷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转变。再加上自正德以后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得到较快发展。嘉靖二年“争贡事件”发生后，嘉靖帝再次申严海禁，使迅速发展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遏制。海商们组成大大小小的海商团，进行走私贸易，对明廷的海禁政策进行激烈的反抗。倭寇与海商相结合，形成了嘉靖时期的“倭患”。隆庆帝即位后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合法化，出现了郑芝龙等海商集团，此时白银大量

---

陈尚胜：《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孙光圻：《论明永乐时期的“海外开放”》，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晁中辰：《论明代海禁政策的确立及其演变》，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李金明：《明代后期海澄月港的开禁与都饷馆的设置》，《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王玉祥：《明代海运衰落原因浅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沈定平：《明代南北港口经济职能的比较研究》，《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徐明德：《论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万明：《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3期；陈尚胜：《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李庆新：《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变态及其政治文化意蕴》，《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章深：《市舶司对海外贸易的消极作用——兼论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发展前途》，《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袁巧红：《明代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陈尚胜：《明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庄国土：《明朝前期的海外政策和中国背向海洋的原因——兼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危害》，载杨允中主编《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薛国中：《论明王朝海禁之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期；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李宪堂：《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尚畅：《从禁海到闭关锁国——试论明清两代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等。

内流，银本位制得以确立，国内商品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因素。商贸的发展促使中国商民移居东南亚，形成了华人华侨社会的基础。

在海禁政策的整体论述中，晁中臣还对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明初海禁原因问题的探讨，他认为不是自然经济的原因，也不是西方人东来的刺激，主要原因应是对政治安全的考虑（张士诚等残余势力和倭寇的威胁）；关于郑和下西洋，晁先生认为，其虽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却没有推动社会进步。<sup>①</sup>

万明、陈尚胜等则主要探讨了明代前期的海外政策，万明认为，明代前期，即明开国至正德初年的一百多年，是明朝海外政策定型和调整时期，这时期的政策基本确定了整个明代海外政策的基调。在研究过程中，他力图展示明初海外政策制定的动态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万明将朝贡贸易和海禁这两大支柱性的海外政策看作一个整体，海禁正是伴随朝贡贸易的初具规模而出现的，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前者极力扩展之日，势必就是后者厉禁之时，这一认识慧眼独具。在描述过程中，他将这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朝海外政策的形成完备阶段（洪武元年至洪武十六年）；第二阶段是明朝海外政策的有效实施阶段（洪武十六年至宣德八年）；第三阶段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调整转换阶段（宣德八年至正德四年）。在通过对明前期海外政策的形成完备、有效实施和调整转换以及对朝贡贸易和海禁的互动进行详尽分析后，万明先生认为，朝贡贸易和海禁相辅相成，盛则同盛、衰则同衰。这三个阶段正展示了朝贡和海禁从形成到极盛再到衰落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央集权统治由加强到渐趋衰落的历史轨迹。<sup>②</sup>

在其著作《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万明将前述论点更推进一步，他认为明代的海洋政策基本是开放的，无论是朝贡贸易还是海禁政策，都没有完全否定海外贸易的存在，而清前期的海禁政策却是完全地禁止海外贸易，包括官方贸易，这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明朝出现封建统治的松动和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倾向，而清政府却形成了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使明朝出现的近代化转向断裂，代之以循环的封建

① 晁中臣：《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 万明：《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3期。

统治，使中国错失近代化的机遇。<sup>①</sup>

庄国土则对明清海禁政策一起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明代前期朝廷厉行海禁和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实际上是明朝抑商和严厉控制人民居留政策的体现，是内政在海外的延续。东南沿海商民的海外开拓，在极端专制的明清政府看来，是游离于朝廷控制的不安定因素，必须予以打击。至于沿海人民的生计，则必须为中央政权的大计而牺牲。郑和则是实施明初海外政策的执行者，其结果是中国背向海洋，毁灭了宋元时期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机遇。但清朝建立了同样的极端专制统治，基本上继承明代的内外政策，葬送了明末清初中国海洋发展的第二次机遇。在明清数百年东南沿海商民面向海洋和朝廷背向海洋的抗争中，强大的中央政权都是最后的胜利者。<sup>②</sup>

陈尚胜也考察了明清前期的海外政策，他认为，明代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宽容到严禁的变化过程。在宣布建立明政权之后，朱元璋鉴于元世祖外交政策之教训，决定对海外诸邦国实行以“怀德”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如此构想包含着一举三得之考虑，即明太祖想以此树立真命天子之形象，缓和士人对新政权之抵触情绪和创造良好国际环境，以便尽快孤立和清除元朝残余势力。<sup>③</sup>

他还认为，万明将明看成是开放的，清看成是封闭的略有不妥，因为在康熙中后期及其以后，中国海商就已经大量合法出海贸易。<sup>④</sup>而且，对比看来，就政治上的考虑来看，清前期的海洋政策反而更具灵活性。清朝所构建的朝贡制度具有谋求自身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显著用意。与明朝相比较，清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在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明朝二祖在海外世界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而专注于自身的边疆稳定和安全，使其封贡体系具有周邻性和边疆

①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庄国土：《明朝前期的海外政策和中国背向海洋的原因——兼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危害》，载杨允中主编《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类似观点也见庄国土《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徐明德：《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及其历史教训》，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徐明德：《论十四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等。

③ 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④ 陈尚胜：《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同样也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防御体系的突出特征。而清朝将周邻诸国的朝贡事务分别安排于礼部和理藩院两个不同机构进行管理,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朝贡事务所做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结合了相关国家和部落的民族特质,体现了清人处理涉外事务的针对性和灵活性。<sup>①</sup> 而从前期商贸制度来看,无论是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商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方面明清都大体一致,没有理由说明代是开放的而清代是封闭的,在某些领域清代反而更进步。所以,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还得另找原因。<sup>②</sup>

陈先生还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明清海禁政策的本质及其结果,他考察了先秦时期儒家等学派的天下观、王霸观、华夷观和义利观,认为这四种观念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天下观支配了中国封建王朝在华夷关系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观念,使封贡关系成为涉外关系的基本模式;王霸观影响了他们处理华夷关系的基本方式,采取“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涉外方针;华夷观使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乐于向外输出中国文化,但却妨碍了他们对于域外文化的认识和吸收;而义利观则导致了中国封建君臣轻视国际贸易利益的倾向。<sup>③</sup> 由此我们就自然而然引申出其对明清海禁政策的态度,即无论如何强调明的开放清的封闭,或强调清的灵活和进步,都无法得出它们能够走入近代化的结论,因为它们的观念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争论仍在继续。但陈尚胜先生对闭关与开放的循环之超越无疑是理论上的一次提升。跳出“闭关”或“开放”的现代逻辑,只关注事实本身来进行研究的代表,除了陈尚胜,还有谢必震、黄国盛、吴建雍、张彬村等。他们都觉察出带着现代概念和话语去研究历史有先入为主之嫌,当务之急乃是面向事实本身。<sup>④</sup>

① 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陈尚胜:《明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③ 陈尚胜:《试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孔子研究》2010年第5期;类似的还有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向玉成:《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与闭关政策的形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郭蕴静:《试论清代并非闭关锁国》,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谢必震、黄国盛:《论清代前期对外经济交往的阶段特点》,《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2年第6期;吴建雍:《清前期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张彬村:《明清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闭关自守?》,载吴剑雄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年版。

④ 陈尚胜:《“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陈尚胜:《闭关与开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陈尚胜先生的研究更为客观和全面。笔者经过详细考察，也发现明代海洋政策和陈先生所论相合甚多，还需推进的就是其论点的深入和扩展，从更高远的视角还原当时统治者的心态。笔者将在这方面做一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据笔者考察，明代海洋政策体现的是一种与现代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宇宙观，对之只有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去理解它，而不是用当今价值观去评判它，才能如实再现其原貌。

从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看，明代都是儒家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汉独尊儒术之局面被魏晋南北朝所打破之后，唐宋士人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是儒家思想的系统整理和发展，而到了明代阳明心学这里，儒学达到了顶峰。在明代，理学和心学并为社会的思想主流。而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皆强调天道之重要性。<sup>①</sup>这种天道思想自然也渗透在统治者的头脑中。

在明代统治者眼中，世界依然是儒道思想中所体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天下万国万民皆为一家，这个宇宙大家庭的运转是靠天道导引的。因此，儒家天道思想是明统治者在制定对外政策时的思想基础。

所谓“天道外交”，就是在天道思想指导下的外交。“天道外交”的基本内涵可表述如下：天地仁德，化生万物，万物之灵长为人。万民凭借对天道之体悟，建邦立国，内安其民，外守己分。但各邦各族资质和能力有所不同，对天道之体悟和践行亦有差别。对天道体悟和践行较早和较深的也就成了最文明和最开化的民族或国家，它负有将天道付诸实践和引导落后种族或国家共赴天道之责任。因此，文明最为开化的国家就成了这一大家庭的中心或大家长，在其周边则是开化较晚或未开化之种族和国家。周边国家就要向核心国家学习和借鉴其先进文明和技术，共同奔向天道所指引的大同盛世。这就形成了天道国际秩序。维系这一秩序的基石是对天道之诚和义。这就需要一种仪式上的保证，即朝贡礼仪。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各个国家拥有根据自己民族特色而独立自由发展的权利，可独立处理民族和国家的内政外交，但在这百花齐放的同时，要有基本的坚守，即是对天道之秩序和仁道之本质精神的坚持。也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大家庭中，各个国家可自由发展，但自

<sup>①</sup> 贾庆军：《阳明思想中“良知”与“良能”概念之关系探究——兼论其“意”之分层》，《当代儒学研究》（台北）2012年第12期；贾庆军：《黄宗羲天理人欲之辩——兼论其公私观念》，《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